

關羽的祖先與後裔： 以山西常平關帝祖祠為中心*

黃壯釗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

三國武將關羽(約160–220)以忠勇聞名於世，身後世人祭祀不輟，歷代王朝也不斷加封爵位，加之戲曲小說等的傳誦，使得關羽崇拜不斷普及，廟宇遍佈天下。因此，學者對關羽信仰一直關注，從信仰的發展變化¹、神話與傳說²、宗教文書³等諸多方面展開研究。然而，現有的研究較少考慮關羽信仰在地方社會的發展脈絡。另一方面，研究區域社會史的學者已有豐碩的成果。他們關注神明信仰在地方的發展

* 本文得到香港特別行政區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第五輪卓越學科領域計劃之「中國社會的歷史人類學研究」(AoE/H-01/08)，以及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洽蕙短期研究贊助金」(2012–2013年度)的資助；侯娟博士與三位匿名審稿人對本文提出了許多寶貴意見，謹致謝忱。

¹ 比如井上以智為：〈關羽祠廟の由來並に變遷〉，《史林》第26卷第1號(1941年1月)，頁41–51；第2號(1941年4月)，頁50–83；黃華節：《關公的人格與神格》(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年)；胡小偉：《關公崇拜溯源》(太原：北嶽文藝出版社，2009年)。

² 參看 Prasenjit Duara, “Superscribing Symbols: The Myth of Guandi, Chinese God of War,”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7, no. 4 (November 1988), pp. 778–95；洪淑苓：《關公民間造型之研究——以關公傳說為重心的考察》(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95年)；李福清：〈關公傳說與關帝崇拜〉，載李福清(著)、李明濱(編選)：《古典小說與傳說》(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頁61–110。

³ 例如胡小偉：《變理陰陽：〈關帝靈籤〉祖本考源及研究》(香港：科華圖書出版公司，2005年)；游子安：〈明中葉以來的關帝信仰：以善書為探討中心〉，載王見川、蘇慶華、劉文星(編)：《近代的關帝信仰與經典：兼談其在新、馬的發展》(臺北：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0年)，頁3–46；游子安：〈敷化宇內：清代以來關帝善書及其信仰的傳播〉，《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50期(2010年1月)，頁219–53。

變遷，從而得以瞭解國家制度與地方社會互動的過程。⁴本文借鑒這種研究視角，以山西常平關帝祖祠的歷史為中心，討論地方社會變遷脈絡下關羽信仰所關涉到的制度、禮儀及群體利益等問題。⁵此外，由於建築物的演變是地方社會變遷的重要象徵，⁶因而本文也探討關帝祖祠在建築結構上的改變，並分析這種變化所體現的意義。

金代的關王祖宅塔

現在位於山西省運城市解州鎮的常平村關帝祖祠（圖一），⁷以關羽的出生地而聞名，每年有大批來自各地的香客與遊客前往進香與參觀。不過，《三國志》只是記載關羽「河東解人也」，⁸並沒有提及常平村這個地方。事實上，常平村作為關羽故鄉的文字記錄，最早也要到金代才出現。

祖祠中有一座磚塔，塔壁鑲嵌一塊題為〈漢關大王祖宅塔記〉的石碑，作者是解州律學張開。張開稱許關羽忠義，又讚歎關羽去世後仍有威靈，「猶賜生民之福」。所以，「今者本莊社人王興，將一千五十四年前祖塔重加完葺，伏願神靈降佑，一境之中，萬事清吉，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即重修祖塔是為了祈求得到關羽保佑。碑記的日期是「大金大定十七年丁酉（1177）三月十五日」，由「直下封村柳園社王興立石」。碑文的最後一行是「金大定丁酉至清雍正九年辛亥四百九十四年張學仁續」。⁹從筆跡看，最後一行字應該是雍正九年（1731）才加刻上去的；而且明代中葉的人就

⁴ 譬如華琛對天后的研究，見 James L. Watson, “Standardizing the Gods: The Promotion of T’ien Hou (“Empress of Heaven”) Along the South China Coast, 960–1960,” in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d. David Johnson, Andrew J. Nathan, and Evelyn S. Rawski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p. 292–324；又如賀喜對雷祖與洗夫人的研究，見賀喜：《亦神亦祖：粵西南信仰構建的社會史》（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

⁵ 侯娟也曾研究過常平關帝祖祠的歷史，並敘述了這座廟宇「從私葺到官修」的過程，但於金代「祖宅塔」與明代官府改建的建築意義，以及關羽祖考故事等方面，尚未闡發。在討論廟宇官方化的影響時，侯娟也注意到一批聲稱是關聖後裔的關姓人，但尚未明了其淵源所自。參看侯娟：〈從私葺到官修：明清山西解州常平關帝廟的演變及影響〉，《山西檔案》2012年第4期，頁43–48。

⁶ 參看科大衛：〈祠堂與家廟——從宋末到明中葉宗族禮儀的演變〉，《歷史人類學學刊》第1卷第2期（2003年10月），頁1–20。

⁷ 這是該廟現在的官方稱謂，鄰近村民也稱之為關帝家廟或常平關帝廟。明清時期，該廟有多種名稱，例如義勇武安王廟、漢壽亭侯廟等。改變名稱與歷代關羽封爵的變化有關。為方便計，本文主要以「常平關帝祖祠」或「常平關廟」作為名稱。

⁸ 陳壽：《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卷三六，頁939。

⁹ 筆者有該碑照片。碑文參見張培蓮（主編）：《三晉石刻大全·運城市鹽湖區卷》（太原：三晉出版社，2010年），頁36。以下引此書時，標點或有改動。另外，金大定丁酉至清雍正九年辛亥，應該有554年之差，而非494年。

已經看見「塔上嵌片石，知在金大定十七年本莊社人王興重修」，¹⁰所以目前所見到的石碑，應該就是大定十七年立碑時留下的。根據碑文，當時下封村¹¹（明清時期的常平村）百姓認定他們的塔建在關羽的祖宅裏。

民間崇拜關羽，自關羽死後就開始了。唐代以後，尤其是北宋以降，得益於佛道兩教吸納關羽進入教內神靈，以及歷代王朝加爵封賜，關羽崇拜得以不斷普及。¹²具體到解州本地，則需要注意位於解州城西的關帝廟。成化《山西通志》記載這座廟是北宋元祐七年（1092）建的。¹³不過，根據該通志所收的碑文，「侯〔關羽〕本解人，廟宇郡城之西，其俗以李〔立〕秋九日，合諸里社之民大享神而迎送之。廟久不治，里中父老相與營加完新焉」，則這一年算是重新修葺。¹⁴進入金朝，朝廷於泰和三年（1203）敕令重修此廟，足見這座廟的重要性。當時的情形，知州田特秀寫道：「廟在郡〔解州〕城之西，春秋祈祀，送迎奔走，四遠之人，惟恐其後。」¹⁵可見金朝時期，這座位於解州城城西的關廟，延續了北宋以來的尊崇地位。由此可知，大定年間下封村百姓修建關王祖宅塔，大抵是與整個解州地區的關羽崇拜相呼應的。

要祈求關羽神靈保佑，則需要有相應的祭祀。可惜沒有資料記載當時是如何祭祀的。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金代下封村百姓所建的是一座塔，而塔是佛教建築。¹⁶在這一時期修刻的佛教經典大藏經，其捐助資金的主要來源地就是解州地區，而且位於解州西二十里中條山上的天寧寺就是刻版的地方。¹⁷此外，之所以在故宅建塔，是有其特定意義的。明嘉靖年間（1522–1566），常平村父老相傳：塔下是井，關羽逃亡在外時，其父母投井自殺，後人因而蓋塔以作紀念。¹⁸這種說法，與塔用於掩藏遺骨的作用相呼應。¹⁹總之，關王祖宅塔的修建，顯示的是佛教的影響。

¹⁰ 〈解州常平里重修漢義勇武安王廟記〉，嘉靖三十四年（1555），載《三晉石刻大全·運城市鹽湖區卷》，頁109。

¹¹ 這裏的村名有兩種讀法，一種是「直下封村」，另一種是「下封村」，即「直」為當值的意思，指王興是下封村柳園社的當值頭人。筆者選擇「下封村」的讀法。

¹² 參看劉永華：〈關羽崇拜的塑成與民間文化傳統〉，《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2期，頁78–84；胡小偉：《關公崇拜溯源》，上冊；王見川、皮慶生：《中國近世民間信仰：宋元明清》（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頁261–75。

¹³ 成化《山西通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民國二十二年（1933）影鈔明成化十一年（1475）刻本（濟南：齊魯書社，1996年），卷五〈祠廟〉，頁120。

¹⁴ 鄭咸：〈重修漢壽亭侯廟記〉，載成化《山西通志》，卷十四，頁515。

¹⁵ 成化《山西通志》，卷五〈祠廟〉，頁120；田特秀：〈重修顯烈廟碑〉，載成化《山西通志》，卷十四，頁515–16。

¹⁶ 參看 Gregory Schopen, *Bones, Stones, and Buddhist Monks: Collected Papers on the Archaeology, Epigraphy, and Texts of Monastic Buddhism in Indi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7), pp. 204–37。

¹⁷ 參看扈石祥、扈新紅：〈《趙城金藏》史迹考〉，《世界宗教研究》2000年第3期，頁38–39。

¹⁸ 〈解州常平里重修漢義勇武安王廟記〉，頁109。

¹⁹ 參看劉淑芬：《中古的佛教與社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頁290–316。

明前期的塔廟

這座塔在元代沒有相關記錄。進入明代，成化《山西通志》記載解州東十八里的常平村有壽亭侯廟，並認定「為侯故里廟」。²⁰這說明，自金代以來所認定的下封村為關羽故鄉的說法，一直延續到明代，而且人們還在當地建廟祭祀關羽。不過，這座廟宇並沒有受到官府的注意。在當時的解州，重要的是位於州城郊西的關王廟，屬於官府的祀典廟宇。²¹「每歲以夏四月八日，本州運鹽使司官各致祭，晉王遣祭，居民遠近莫不享賽」。²²在常平村建立關廟，與解州關廟所帶動的關羽崇拜是相配合的。

大概由於「關羽故里」名稱的宣傳效果不錯，常平關廟得到來自北部邊防沿線軍官的贊助。現仍保存在常平關帝祖祠內的「關王故里」牌坊，其明間東西兩柱都立於正德十年（1515）。明間西柱的題名為：「萬全都司萬全右衛 / 義官劉隆，室人梁氏妙能、張氏美全，男生員劉應麟、劉應奎、劉應麒、劉應鸞， / 父劉景春，母趙妙秀， / 堂兄劉璋，嫡女劉妙寶、劉妙金， / 婿本衛指揮僉事李堂、同知楊震， / 舍人蔣琮婚、侄男劉暉。 / 店主侯大本，男侯卿、侯公。 / 石匠薛隆、薛銑、薛愈。」²³明間東柱則刻著同屬萬全都司萬全右衛的義官杜□及其家人的名字。中柱的東西兩柱則立於正德十四年（1519），題為「萬全都司宣府左尉〔衛〕義官王義同弟王普施柱一根」，另外還有店主與石匠的名字。²⁴

以上三家捐資者，均來自長城沿線的萬全都司。其中，劉隆的兩個女婿，分別官至萬全右衛指揮僉事與指揮同知，軍職不低；同時，「義官」的榮譽頭銜顯示這些人富有。²⁵之所以贊助建設常平關廟，應與關羽崇拜在軍中流行有關。²⁶正統年間（1436–1449），與萬全都司相鄰的山西行都司大同城關羽廟的重修，便得到軍官的贊助。²⁷關於「店主」，侯娟猜測「很可能是開設鹽店的商人」，並估計這些衛所軍官是

²⁰ 成化《山西通志》，卷五〈祠廟〉，頁120。明初以降，京城有祭祀關羽的專祠，朝廷也定期派人祭祀，可見立廟祭祀關羽是得到國家認可的，參看胡小偉：《護國佑民——明清關羽崇拜》（香港：科華圖書出版公司，2005年），頁49–80。

²¹ 宣德二年（1427）解州官員的上疏顯示這座廟列入祀典，見《明宣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卷三四，宣德二年十二月甲戌，頁868。

²² 成化《山西通志》，卷五〈祠廟〉，頁120。

²³ 《三晉石刻大全·運城市鹽湖區卷》，頁84。筆者根據實物校改了碑文。

²⁴ 同上注，頁84–85。

²⁵ 大概從正統年間開始，朝廷從民間收集糧食以為賑濟或倉儲之用，給出資或捐糧的人頒授「義民」或不管實事的散官頭銜（統稱「義官」）。獲得這些頭銜，既可以相應免除一定的雜泛差徭，也提高了自身的社會地位。參看《明英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卷四一，正統三年夏四月癸未，頁812；趙克生：〈義民旌表：明代荒政中的獎勸之法〉，《史學月刊》2005年第3期，頁47–52。

²⁶ 關羽是明朝軍隊尊崇的神明，軍隊中流傳著不少關羽顯靈助陣的傳說，參看胡小偉：《護國佑民》，頁119–32。

²⁷ 楊堦：〈義勇武安王廟記〉，載成化《山西通志》，卷十四，頁517–18。

來河東做鹽生意。²⁸然而，「店主」與「石匠」相鄰，也有可能指石店的老闆。這些居住在距離解州千里之外的軍戶家庭，未必親臨常平關廟。他們的名字刻在他們捐獻的石柱上，也可能是修建常平關廟的募資者跑到北邊籌集捐款的結果。當然，也有可能這些在北邊衛所生活的人，他們的原籍就在解州，並且與解州保持聯繫。²⁹

總而言之，萬全都司軍戶家庭向常平關廟捐資，顯示關羽信仰在軍中流行，以及常平關廟名氣與信仰範圍的擴大。

嘉靖年間廟宇的改建

根據嘉靖三十四年(1555)的碑刻，常平關廟在成化十二年(1476)、嘉靖二年(1523)以及嘉靖九年(1530)曾三度重修。³⁰嘉靖二年的重修，巡按監察御史王秀為「關王故里」牌坊題詞，³¹顯示官府參與其事。之所以到十六世紀前期官府開始重視常平關廟，根據侯娟的研究，這與鹽池南岸解鹽的走私活動有關：明朝一開始便在鹽池北岸設置長樂巡檢司，並在鹽池門外設置鹽池巡檢司與聖惠巡檢司，而在池南則不設巡邏。因而走私者就主要走池南一帶，經由南面的中條山運送私鹽。正統十二年(1447)，河東鹽運司奏請把長樂巡檢司移到池南，以圖打擊走私活動。不過，池南一帶的走私並沒有因此消失。嘉靖二年以前，位於常平村附近的西姚村便是池鹽走私活動的一個重要據點，直到嘉靖二年才被巡鹽御史搗毀。總之，池鹽的走私以及緝私的需要，促使官府關注池南的情況。³²官府參與重修常平關廟，就是他們試圖把勢力擴大到池南的結果。

不過，嘉靖三十三年(1554)左右任職解州知州的徐祚，卻否認官府參與重修，認為廟宇「皆鄉民私葺，官不與知焉」。³³這大概是指三次重修主要由鄉民籌資，³⁴不過更重要的在於他想否定「鄉民私葺」時期的建築格局。徐祚寫道：「視篆後，往來經

²⁸ 侯娟：〈從私葺到官修〉，頁44。

²⁹ 這個觀點是匿名審稿人提示的，可惜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遼寧省檔案館編的《中國明朝檔案總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所收《武職選簿》沒有關於萬全都司萬全右衛的資料，乾隆《萬全縣志》(中國國家圖書館藏乾隆十年[1745]刻本)也沒有這方面的記錄，所以目前難以確定。

³⁰ 〈解州常平里重修漢義勇武安王廟記〉，頁109。

³¹ 該牌坊至今仍保存在常平關廟。另，《三晉石刻大全·運城市鹽湖區卷》誤作「關公故里」，見頁84。

³² 侯娟：〈從私葺到官修〉，頁45。

³³ 〈解州常平里重修漢義勇武安王廟記〉，頁109。

³⁴ 嘉靖八年(1529)重修關王祖廟塔堊，資金主要是由募緣道士賀演靖主持籌集的，捐資的有北京錦衣衛指揮同知、錦衣衛千戶、北京商人、宣府萬全都司右衛商人、大同商人，也有來自本地的如鹽池巡檢司巡檢、解州典膳諸人，以及來自安邑縣的人，還有與常平村相鄰的曲村與蠶方(今蠶坊)以及常平本村等人，可見該廟的信仰範圍非常廣。見〈重修關王祖廟塔堊施銀碑〉，嘉靖八年，載《三晉石刻大全·運城市鹽湖區卷》，頁94-95。

常平，祇謁王祠，乃知祠舊在塔前。嘉靖初，巡按侍御王公秀豎石為坊，榜曰『關王故里』。後來君子以為坐背考妣非宜，乃改廟南向，前面中條山，後倚麟池，挹靈吞秀，于義尤當。乃巡鹽侍御尚公維持發公帑金以倡，侍御宋公儀望繼有所助，而前解守張侯習、判官王子大用各捐金以相其成。」³⁵尚維持於嘉靖三十年(1551)始任河東巡鹽御史，其接任者宋儀望則是嘉靖三十三年離任，³⁶由此可知這次改建發生在嘉靖三十年至三十三年之間。對於這次改建，知州徐祚仍不滿足，認為「故里之坊，猶未移置，居塔前。維正殿苟完，而寢宮未辟，殊為闕典」。於是，徐祚「出贖罪金及谷米之類為工食費，召匠增修，歷三時而後底績。乃移石坊於前衢，外為大門四楹，耳門各二楹，入門稍東即稱古塔也。中建虛榭，以為鄉民伏臘陳獻之所。正殿六楹，繚以回廊，環列一十五柱。東西建廡各十楹，繪王神績。後為寢宮四楹，繚以十二柱。金碧輝煌，謁者改觀」。³⁷

徐祚不僅重新規劃與建設常平關廟，還希望該廟也能如解州關廟一樣香火旺盛：「王廟在解城西郭外，每歲孟夏八日，秦晉汴衛鄰省之人，男女走謁，拜於道者蟻相聯，固煒華震耀矣。常平為王里宅，尤宜表樹。第近山多風，垣墉瓴甍易於摧毀，余特記厥成于石，揭諸廟庭，俾後之繼守茲守而進謁者，知興修之難而摧頹之易也。視其將圯，即嗣而葺之，庶幾斯廟永永無斲。豈直於祭法勤事，定國之典，允合弗戾，而實於朝家表忠崇德之旨，恪遵無墜焉。詎非有司之職，守臣之任哉！」³⁸徐祚這是在為自己重修常平關廟作理論支持。解州關廟列入王朝祀典，由官府按時祭祀。徐祚則強調常平是關羽故里之地，以說明常平關廟更值得重視。

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關廟重修完成不到一年，發生大地震。據方志記載：「有聲如雷，初自西北來，轟轟然土氣沖天，地裂成渠，井水外溢。城郭祠宇官民廬舍盡傾，壓死人畜無算。至次年春未息。」³⁹大約十年後，常平關廟看起來「像貌肅而株宇則摧毀，基址存而規制則卑隘」，就是這次地震造成的。嘉靖四十三年(1564)，時任河東巡鹽御史的胡鑰在里老請求下，命解州知州動用「香緡銀」進行重修。這些「香緡銀」應該是解州關廟廟會上所收的香稅，專供解州關廟祭祀之用。不過，胡鑰認為「以王之故物，修王之故里，王所樂為也」，因而用解州關廟的香火錢來修常平關廟並無不可。結果，「乃修正殿五楹，前為獻台，中虛四達，報祭有所。東西行廊二十楹，廊下有亭。亭南為儀門，祖塔在其東。再南為大門，門外有坊有壁，以壯

³⁵ 〈解州常平里重修漢義勇武安王廟記〉，頁109-10。

³⁶ 馮達道(纂修)、張應征(續修)：《新修河東運司志》，《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影印清康熙十一年(1672)刻本(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6年)，卷三〈職官〉，頁553。

³⁷ 〈解州常平里重修漢義勇武安王廟記〉，頁110。

³⁸ 同上注。

³⁹ 陳時(裁定)、介孝璿(纂修)：康熙《解州志》，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刻本(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藏縮微膠捲，編號：mic 1945 no.1474082)，卷十二〈彙異志·災祥〉，頁十三上至十三下。

觀瞻，蔽內外。後為寢宮五楹，左右房六楹。迤東為道院，祀香火者居之，院建老子殿三楹。牆垣周圍百丈，飾以繚檐，宏敞雄麗，視其改觀。⁴⁰

常平關廟改建後，成為一座符合儒家倫理與官方規制的廟宇(圖二)。不過，明朝的典章制度並沒有對關廟的建築規制作出明確規定，那麼，建設關廟時有甚麼可以參考？通過比對，可以知道一般在各州縣都有建立的城隍廟，其建築規制給官員提供了參考。根據建築史學者的研究，明代中葉，城隍廟的基本建築格局已經確定，即在中軸線上布置大門、儀門、正殿與寢宮，並在正殿之前東西兩側設置廊房(即廡)，形成三進院落。⁴¹ 運城關王廟於嘉靖五年(1526)進行擴建，擴建後的建築布局就跟城隍廟一樣：「凡殿而寢者，廊而復者各一，廡而列者二，門而闢者三，一則門之正，二則門之儀者也。」(圖三)時人對各建築物的理解是：「寢以祀王之配，廊以設王之幾，而廡則繪王平生履歷之迹也。門之正者，為王神路；門之儀者，以便禱祀之出入也。」⁴² 通過比對，可知改建後的常平關廟，其主體建築的格局設置與運城關王廟以及城隍廟的規制基本一致。

與建築改建相配合，地方官還努力將常平關廟的祭祀納入官府的祀典體系內。

成為解州祀典廟宇

嘉靖四十四年(1565)，重修常平關廟後，解州地方官向御史胡鑰呈文，希望將常平關廟納入解州祀典廟宇。呈文指出：「思得禮可以義起，事待于人為，廟貌既新，廢祀當舉。本州欲以王之香緡，供王之父母。遇每歲清明節，先期動庫貯香錢銀拾兩，領於本村鄉老，備豬二口、羊二羖、油果六卓、時果八盤、饅頭兩卓，香火燈燭俱全。分為二祭，至期，州官親詣行禮。一祀于武安王神位前，一祀于先人墓塚，亦如民間祭掃之儀，於禮似為得宜。」⁴³ 所謂「先人墓塚」，指祖塔所在地，亦即「塔塋」，那裏被認為是關羽父母投井身亡的地方。此外，由於與解州關廟相鄰的崇甯宮的道士，「原系供王香火而設」，而且「祭田五頃，皆為佃種」，所以知州認為「既厚享王利，亦當少竭虔誠」，並建議每逢清明節，道官應該帶領道士到常平關廟，「建設清醮三日，庶見崇報之意」。所請得到胡鑰的批准。胡鑰認為「該州所議，推王之意，以厚王之親，此禮本情生，法緣義制，于神於人兩得之矣」。⁴⁴

⁴⁰ 〈重修解州常平義勇武安王廟記〉，嘉靖四十四年(1565)，載《三晉石刻大全·運城市鹽湖區卷》，頁121。

⁴¹ 包志禹：〈明代北直隸城隍廟建築規制探析〉，載王貴祥(主編)：《中國建築史論叢刊》第3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304-16。

⁴² 〈重修義勇武安王廟記〉，嘉靖七年(1528)立石，載《三晉石刻大全·運城市鹽湖區卷》，頁93。

⁴³ 〈常平村重修關公故里祠墓碑記〉，嘉靖四十四年，載《三晉石刻大全·運城市鹽湖區卷》，頁123。

⁴⁴ 同上注。

這次禮儀的創制，確認了常平關廟的祭典規制，並納入官府的祀典範圍內。之所以在清明節進行祭祀，是因為其祭祀對象之一是關羽的父母。用於供奉關羽考妣的資金，來自專門祭祀關羽用的香稅，體現了孝的觀念；而提倡孝道，是嘉靖朝「大禮議」後政治的一個重要風向。⁴⁵由此足見王朝政治影響之廣，在遠離北京千里之外的鄉村廟宇也有所體現。

隆慶二年（1568），新任解州知州呂文南認為改建後的常平關廟仍然簡陋，與關羽的崇高地位不相稱，因而又主持重修了一次：「門外屏以琉璃，四周圍以垣墉，寢殿益以暖閣。鼎炮齋之建，新廊廡之飾。施三清道院之丹堊，培迤西護廟之堰防。區畫詳密，制度崇嚴，翼然煥然，爰殊往格。」⁴⁶

當然，美觀的建築物需要恆常維護。隆慶三年（1569）清明節，知州呂文南依照祀典規定到該廟祭祀，「見磚瓦風裂，堂階茅塞」。經詢問才知道「司廟者無專人耳」。於是，四月八日解州關廟廟會結束後，呂文南從香稅中撥出大約十兩銀子，購買二十多畝田地，「貽司廟者長久之計」，以求「廟得人守而常新」。⁴⁷文獻沒有交代這些田是登記在常平關廟名下，還是給予關廟司理者的補貼。究竟這些司廟者是誰？根據買地契的署名，鄉老張九榮、衛有智，以及道士郝崇安及其門徒門孫見證了田地的買賣，所以他們很可能就是參與管理廟宇的人。可惜這些田如何管理，史無所載。不過，崇禎二年（1629）的記錄顯示明末的常平關廟根本沒有祀田。⁴⁸由此可以推知，這批田或者就是給司廟人的補貼，或者被那些司廟人侵吞了。

關羽祖塋的「發現」

萬曆年間，關羽受封為帝，地位崇高至極。⁴⁹這大概使得官員更加重視對關羽的祭祀。大約崇禎二年，河東道兼山西布政司右參議張法孔到常平關廟拜謁，當他得知

⁴⁵ 關於「大禮議」，簡而言之，正德皇帝死後沒有子嗣，於是朝臣請嘉靖皇帝來繼承皇位。大部分朝臣希望嘉靖皇帝視自己為正德的繼子，以維持一貫的皇室血脈；不過嘉靖皇帝不同意，認為奉祀自己的父親才孝順。少數迎合嘉靖皇帝的大臣則到自己的家鄉修建本宗的祠堂，用這種「孝順」的行為來作政治上的表態。不久，朝廷也修改了法律，使得老百姓仿照「家廟」規制而建的祠堂合法化，從而推動宗族社會的形成。參看 Carney T. Fisher, *The Chosen One: Succession and Adoption in the Court of Ming Shizong* (Sydney: Allen & Unwin, 1990)；閻愛民：〈「大禮議」之爭與明代的宗法思想〉，《南開史學》1991年第1期，頁33–55；David Faure, *Emperor and Ancestor: State and Lineage in South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9–10。

⁴⁶ 〈重修常平武安王廟記〉，隆慶二年（1568），載《三晉石刻大全·運城市鹽湖區卷》，頁127。

⁴⁷ 〈買地碑記〉，隆慶三年（1569），載《三晉石刻大全·運城市鹽湖區卷》，頁128。

⁴⁸ 〈計開買地五契〉，隆慶三年，載《三晉石刻大全·運城市鹽湖區卷》，頁128–29；〈祀田碑記〉，崇禎二年（1629），載同書，頁201。

⁴⁹ 張鎮：《解梁關帝志》，收入魯愚等（編）：《關帝文獻匯編》第2冊（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卷一〈封號〉，頁562–64。

該廟沒有祀田，便撥出白銀五十兩讓解州方面購買田地，作為供奉香火的贍田。解州知州羅於垣親自到常平辦理此事，結果買了二十四畝近廟居民的田地。羅於垣還報告說，距離關帝廟十里左右的石磬溝，是關羽祖塋的所在地。該處「山勢圍環，凹凸掩映，因名黑峪懷。雖世遠跡淹，詢之耆叟等，口傳有不容泯滅者，僉云從來未舉稱號。今蒙修廢崇祀，亦足以補千百年之缺典矣」。「世遠跡淹」的說法，表明作者其實也明白耆老傳說並不可靠，而且從來沒有相應的祭祀，無人知道關羽的祖塋在何處。

羅於垣又敘述道：「查得解民每歲以四月初八為關聖受封之期，六月念二日為誕辰，五月十三日為忌日，展奠沿為成規。但清明日祭掃紛然，而此獨匱祀。於是先期潔拭祖塋，動支租銀，預備牲禮、香燭、果品致奠。」⁵⁰據此，前述嘉靖四十四年官府所訂立的在清明節祭祀關羽以及關羽父母的祭儀，並沒能延續到崇禎二年，因而需要重新安排祭祀。而且，「先期潔拭祖塋」的舉動，說明清明日祭祀關羽的目的在於安排祭祀關羽祖墳。此外，由於各省直地方都會在五月十三日舉辦賽會，即較大型的祭祀活動，而常平關廟雖然在這一天也有展奠之儀，但是規模大概很小而顯得「寥落」，因此知州羅於垣建議也舉辦賽會，「屆期亦支租銀，預辦牲禮、祭品等項」；而且這兩次祭祀應該「俱委廉能教官壹員，以祀先師之禮祀之，則常平即闕里也」。⁵¹可見這時候人們有意將對關羽的祭祀規格與孔子祭儀看齊，試圖將常平村打造成跟孔子的故鄉山東闕里一樣重要。在闕里，嘉靖以前就有單獨的啟聖王殿來祭祀孔子的父親。嘉靖九年，因應當時的政治鬥爭，朝廷令兩京國子監與天下學校都要建啟聖公祠。⁵²朝廷既認可對聖人祖先的祭祀，解州地方官對此時「發現」的關羽祖塋自然大力支持。羅於垣感歎道：「是役也，因新壇而思及故丘，幾百代荆榛若辟，妥祖彌而愴念春夏數千年，水木追崇，斯關聖之所以敬止維桑，而啟聖之所以血食未艾也。」並建議在清明節安排祭祀關羽祖墳。對此，河東道張法孔也贊成，認為：「黑峪懷既為聖祖佳城，清明日潔庀豚蹄致祭，當矣。仍當芟辟荆榛，昭明景象，使大聖發祥奧區，為士民瞻禮盛地可也。」⁵³結果，清明節不只要到常平本廟祭祀關羽，也要到「新發現」的祖塋致奠。這種祭祀安排，至少延續到清代康熙年間。⁵⁴

關於贍田的管理以及祭品安排，知州羅於垣的做法是：「每歲置印信簿二扇，內載實在地畝若干，每年收麥谷若干，封銀若干，貳祭支用若干，餘存、賞道童若

⁵⁰ 〈祀田碑記〉，頁201。

⁵¹ 同上注。

⁵² 參看李東陽等(撰)、申時行等(重修)：《大明會典》(揚州：廣陵書社，2007年)，卷九一〈群祀〉，頁1449；黃進興：《優入聖域：權力、信仰與正當性》(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142-84。

⁵³ 〈祀田碑記〉，頁201。

⁵⁴ 參看康熙《解州志》，卷六〈禮儀志〉，頁十五上。

干。一扇給道童收租，一扇存本州查考。」這些負責收租的道童，應是居住在常平關廟道院裏供奉香火道士。大概鑒於隆慶年間購買的田地沒有著落，因而這時要設置「印信簿」，以便於官府查核。同時，「仍置印信胙簿兩扇，內載祭豬貳只，每只伍拾觔；羊貳只，每只重貳拾觔；香燭、果品各價若干，共銀若干。事畢，將豬、羊胙每祭給道童豬首壹枚約捌觔，羊胙三觔，烹獻尊神，其餘分送禮生、鄉官，及犒賞應事人役」。⁵⁵可見，官方的祭祀能給參與者帶來一份豐盛的食物。

關羽祖考的塑造

崇禎年間關羽祖塋的「發現」，只是確定墓穴的位置，提供一個可供祭祀的地方。進入清朝，常平士子與地方官則進一步為關羽的祖考定名。這大抵仍是為了將關羽與孔子並列，因為孔子祖上三代的名諱早載於《史記》而流傳於世。⁵⁶解州知州王朱旦記載了為關羽祖考尋名的經過：「康熙十七年戊午〔1678〕，常平士子于昌肄業塔廟，即道遠公之舊居。昌醇篤劃，夢關侯呼授「易碑」二大字，督視殿西物，急白郡。寤而就焉。有浚井者得巨碣，悉字碎。昌即合碣，即侯考奉祀厥考之主，中紀生死甲子，僅兩世，字諱太略。因循山求墓，遂合券，奔告郡守。」⁵⁷由此可知，關羽祖考兩代的生卒名諱，就是常平士子于昌創造出來的。

王朱旦也講述了一個夢來表示支持：「旦于丁酉〔順治十四年，1657〕秋旅宿涿，夢侯揖迎，升臣巨觥曰：『煩椽筆敘生平文。』顧周將軍倉曰：『已極醉，須疾扶，勿致傷。』次日，遇客邀飲醉，墜馬觸巨石無恙，為〈關侯論〉一篇。此合諸昌所陳，則關侯前論，欲表其先塋歟？」⁵⁸這裏，王朱旦用二十一年前的一個夢，來說明他為何贊同于昌關於關羽祖考生平的說法。然後，根據于昌所提供的關羽祖考名諱及生卒信息，並配合《三國志》、《三國志平話》以及《三國演義》等書籍的記載，⁵⁹王朱旦如此書寫關羽的祖考及關羽本人的生平事蹟：

侯〔關羽〕祖石磐公，諱審，字問之，以漢和帝永元二年庚寅〔90〕生，居解梁常平村寶池里五甲。公沖穆好道，研究《易傳》、《春秋》。……至桓帝永壽三年丁酉〔157〕終正寢，壽六十八。子字道遠，諱毅，篤孝有至，性仍先志。具窀穸於所著讀處。……道遠公廬墓號踴，終喪，歸村居，已為桓帝延禧二

⁵⁵ 〈祀田碑記〉，頁201。

⁵⁶ 參見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卷四七〈孔子世家〉，頁1905。

⁵⁷ 〈漢前將軍關壯繆侯祖墓碑銘〉，康熙十九年（1680），載《三晉石刻大全·運城市鹽湖區卷》，頁229。

⁵⁸ 同上注。

⁵⁹ 關羽在上述史傳小說以及歷代戲曲中的形象，參看洪淑苓：《關公民間造型之研究》，頁27–128。

歲〔159〕。明年庚子〔160〕六月二十四日產壯繆侯。……侯生而英奇雄駿，既受《春秋》、《易》，旁通淹貫，以古今事為身任。稍長，娶胡氏，於靈帝光和元年戊午〔178〕五月十三日生子平。次年弱冠，……詣郡陳時事。不報。……歸旅次，聞鄰舍哭，極哀。叩之曰：「韓守義也，遭郡豪呂熊荼毒。呂党連七姓，黠猾事中璫，蔑職紀。」侯皆裂發豎，命守義導至七所，悉斬刈之。潛引去。意郡守稔群惡，必原義士，勿引繩批根。而有司憚文法，遽迫求之。於是道遠公暨配淹芳腐井。……胡氏抱平避母族免。里人遂指石磬公發祥之所，為凶地絕塋，久委之陰翳。⁶⁰

《三國志》並沒有關於關羽讀書的記載，南朝裴松之（372–451）給《三國志》作注的時候，才提到關羽喜好並熟讀儒家經典《春秋左氏傳》。因而，宋元時期，那些想按儒家理想人格來塑造關羽忠義形象的讀書人，便在此找到了依據。⁶¹王朱旦則進一步發揮，說關羽祖父石磬公是研究《易傳》、《春秋》的學者，而且父親道遠公也是讀書人，以此來說明關羽之所以好讀《左傳》，是有其家學淵源的。另外，「道遠公暨配淹芳腐井」的敘述，也與關羽父母投井自盡的傳說相匹配。至於「里人遂指石磬公發祥之所，為凶地絕塋，久委之陰翳」的說法，則是為了與明末才「發現」關羽祖塋的事實相配合。由此可見知州王朱旦準備充分。然而，這段精心設計的敘述還是露出破綻，「寶池里五甲」所顯示的里甲，其實是明清的制度。⁶²

再次「認定」了關羽祖塋之後，與此相配合的是康熙二十年（1681）左右創建關帝祖塋蕭牆，並重新修葺墓塚。從捐款名單看，為此次祖塋修建捐款的人，其範圍遠超出解州地域，相鄰的蒲州、澤州、絳州及所屬縣地區，甚至河南都有官吏捐資，當然還包括商人、信士，也包括常平關廟鄰近鄉村的村民。⁶³

與官府的建設相呼應，當地士紳父老於康熙二十三年（1684）創建了樂樓，並重修塔亭。不僅如此，他們還想創塑關聖父母的金身。為此，他們這樣說：

關聖於靈帝光和二年己未〔179〕，憤世嫉邪，殺豪伯而出奔。聖父母顯忠遂良，赴金井而身亡。至中平元年甲子〔184〕，里人為帝有扶漢興劉之舉，遂建塔井上。金大定十七年，又有本社王興重加弘竣。凡往來之過客，只見其塔，不知其塔為墓者十有八九。即詢知其來歷者，亦不過指塔而三歎曰：「聖父母其在斯乎？聖父母其在斯乎？」愚等近聖人之居，忍千百年以上之英靈，

⁶⁰ 〈漢前將軍關壯繆侯祖墓碑銘〉，頁228。

⁶¹ 參看劉永華：〈關羽崇拜的塑成與民間文化傳統〉，頁79–80。

⁶² 關於明清里甲制度，參看劉志偉：《在國家與社會之間：明清廣東地區里甲賦役制度與鄉村社會》（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28–55。

⁶³ 〈佈施助工官民題名碑〉，康熙二十年，載《三晉石刻大全·運城市鹽湖區卷》，頁232–33。

無融融泄泄之樂。千百年以下之民人，無見像作禮之誠。揆諸聖心，其能悅乎？所謂本情制禮之謂何，因義起事之謂何也？於是日之夜，張正經、辰發科夢塔亭之中有二鐵人，從地下分土而出，遂呼眾扶置供桌之上。次日，二人言夢中之事，略無異焉。眾相駭然曰：「神之顯靈，昭昭如也。」因而僉發□心，募塑金身。⁶⁴

講述故事的人是作為廟宇管事者的神首，包括鹽池司巡檢王閏、庠生于昌、靳毓琦，鄉耆王鳴鳳、張正經、辰發科、張堯、王國禹、耿運明等。⁶⁵他們就是康熙二十年修建關帝祖塋的組織者，主要來自關帝廟附近的常平村、曲村與蠶房村等。⁶⁶為了創塑關羽父母的金身以便展開相應的祭祀活動，鄉耆張正經與辰發科用「夢昭靈爽，異地相同」的靈異故事，來彰顯祭祀關帝父母的必要。

《聖蹟圖誌》與追封關羽三代

解州知州王朱旦承認有關關羽祖考的說法並撰寫碑記，以及鄉民創塑關聖父母金身等活動，推動了關羽祖考故事的流傳。

江蘇淮陰人盧湛一家幾代有祭祀關羽的傳統。康熙三十一年(1692)，盧湛從朋友那裏得到上述王朱旦所寫的記文，並收入他自己編纂的《聖蹟圖誌》。⁶⁷在序言中，盧湛記載了他讀到關羽祖考故事時的驚喜心情，並稱是關羽報夢給他傳了指示，才促成他編輯此書。⁶⁸不僅如此，他還積極邀請高官與學者來為此書寫序。官員也清楚關羽祖考故事並非真實，如總督河道提督軍務兵部尚書于成龍說：「余受而讀之，知建安迄今一千五百年，而聖祖父之名號、年歲、里居、世業，始發蹟於解梁塔廟之井磚，得夢於士子，叶夢於州牧，則其事奇也，其靈顯也。」⁶⁹于成龍對該事雖然有所懷疑，但也深表許可：「奇不可以不傳，顯不可以不誌。況夫子之家學世德、誕降

⁶⁴ 〈創塑關聖父母金身碑〉，康熙二十三年(1684)，載《三晉石刻大全·運城市鹽湖區卷》，頁236。

⁶⁵ 同上注。

⁶⁶ 〈佈施助工官民題名碑〉，頁232–33。

⁶⁷ 王朱旦：〈漢前將軍壯繆侯關聖帝君祖墓碑記〉，載盧湛(彙輯)，于成龍(鑒定)，陳宏謀、沈德潛(增訂)：《關聖帝君聖蹟圖誌全集》，敦五堂重刊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刻本(哈佛大學圖書館藏電子版，HOLLIS Number: 008045508)，卷一〈發祥考〉，頁五上至九下。幾篇序言都稱此書為《聖蹟圖誌》，封面則題《關聖帝君聖蹟圖誌全集》。關於此書的版本以及內容介紹，參看李世偉：〈創新聖者：《關聖帝君聖蹟圖誌》與關帝崇拜〉，載《近代的關帝信仰與經典》，頁71–76。

⁶⁸ 盧湛：〈序〉，載《關聖帝君聖蹟圖誌全集》，頁一上至四下。

⁶⁹ 于成龍：〈序〉，載《關聖帝君聖蹟圖誌全集》，頁九上至十下。

非常，寧可不昭示來許，垂諸無窮哉！」⁷⁰持論如此，當是出於其時士大夫塑造關羽忠孝兩全形象的需要。

江南提刑按察使司僉事劉殿邦為該書作序云：「域中有二大倫焉，曰忠、曰孝，如日月之麗於天，如江河之行於地，如五行二氣之周流充塞於宇宙之間，未有不互資為用、相輔而行者，故曰移孝可以作忠，又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凡詩書之所稱述，史傳之所贊揚，生為賢聖，沒為明神，皆此物此志也。」⁷¹提及當時士大夫所認可的倫理道德標準，即需要忠孝兩全。問題是，史書中備載關羽忠義的事跡，卻沒有關於「孝」的記錄：「獨是神聖之生也不偶，大抵推本祖功宗德，以白其發祥之由。而夫子之世系闕焉無傳，致使祖若父啟佑貽謀之德，與夫子趨庭續緒之隱，皆滅沒不可考，豈非在天之靈所耿耿不忘者歟？」為了比較，劉殿邦還特意指出：學宮有專門祭祀孔子父親的啟聖祠，孟子則有孟母教子的故事流傳，「即聖賢亦可無憾」。⁷²由此可以瞭解，士大夫其實是想把關羽塑造成儒家的代表人物，其榜樣則是孔孟。學者符罔在序言中也記載了盧湛編輯此書的願望，就是希望此書「將與吾孔子之家譜世系聖蹟圖並垂不朽」。⁷³所謂「孔子聖蹟圖」，最初是明正統九年（1444）監察御史張楷編纂的，以圖畫形式呈現孔子一生。⁷⁴誠如李世偉所言，「關聖帝君聖蹟圖」的創作形式，就是仿照自「孔子聖蹟圖」。⁷⁵

然而，由於歷代文獻都沒有記載關羽家庭的情況，「使聖祖聖父歷千有餘年不能發潛德之幽光」，因此，常平士子與解州知州共同創造出的關羽祖考故事，正好符合士大夫的需要。瞭解了上述關羽祖考的故事，「而後知我夫子深明於春秋之大義，淵源實有自也」；而這也符合當時士大夫所認同的「忠與孝未有不互資為用，相輔而行者也」。⁷⁶關羽的儒家形象因而得以圓滿塑造。

進入雍正朝，按胡小偉的說法，雍正之所以能在諸多競爭者中脫穎而出並最終繼承皇位，大概使用了一些特殊手法，因而朝野乃至朝鮮使臣都在流傳雍正之所以能夠繼位，是出於矯詔。為了平息物議，雍正皇帝登基之後，即著手標立理學尊王忠君的價值體系。⁷⁷其一就是追封孔子的五代祖先。雍正元年（1723），上諭內閣禮

⁷⁰ 同上注，頁十下至十一上。

⁷¹ 劉殿邦：〈序〉，載《關聖帝君聖蹟圖誌全集》，頁一上至一下。

⁷² 同上注，頁二下至三下。

⁷³ 符罔：〈叙〉，載《關聖帝君聖蹟圖誌全集》，頁二下至三上。

⁷⁴ 參看曲阜市文物管理委員會（收藏）、孔祥林（校訂）：《孔子聖蹟圖》（濟南：山東美術出版社，1988年）。該書也有彩繪本，見仇十洲等（繪）、文徵明（書）、張立華（點校）：《孔子聖迹圖傳》（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年）。

⁷⁵ 關於二者的關係，參看李世偉：〈創新聖者〉，頁76–80。

⁷⁶ 劉殿邦：〈序〉，載《關聖帝君聖蹟圖誌全集》，頁四上至五上。

⁷⁷ 胡小偉：《護國佑民》，頁497–500。

部：「水源木本，積厚流光。有開必先，克昌厥後。則聖人之祖考，宜膺崇厚之褒封，所以追溯前徽，不忘所自也。粵稽舊制，孔子之父叔梁公，於宋真宗時追封啟聖公。自宋以後，歷代遵循。而叔梁公以上，則向來未加封號，亦未奉祀祠庭。朕仰體皇考崇儒重道之盛心，敬修崇德報功之典禮，意欲追封五代並享烝嘗，用伸景仰之誠，庶慰羹牆之慕。」⁷⁸結果，孔子的五世祖先皆得以封爵，並把以前只祭拜叔梁公的啟聖祠改名崇聖祠，增設神主，以祭拜孔子五世祖先。⁷⁹雍正皇帝還親自撰寫〈追封孔子五代告祭文〉，以示隆重。⁸⁰

前面已經提及，明末以來，地方官與常平士民就已經努力把祭祀關羽的規制向祭孔的禮儀看齊，編纂《聖蹟圖誌》也展現了士大夫將關羽與孔子並列的決心，所以孔子祖先得以封王，馬上起了示範作用。雍正三年（1725），給事中李蘭便憑藉《關聖帝君聖蹟圖誌》的記載，向朝廷奏請追封關羽祖考。對於此奏，禮部謹慎應對：「查《聖蹟圖誌》乃係近時盧湛所撰，與正史不合。尊崇正神，理宜詳慎。亞聖孟子之父，未詳名諱，止稱先賢孟孫氏，所以闕疑也。應照此例，追封關帝三代，俱為公爵，牌位止書追封爵號，不著名氏。於京師白馬關帝廟後殿供奉，遣官告祭。其山西解州、河南洛陽縣塚廟，並各省府州縣擇廟宇之大者，置主供奉後殿，春秋二次致祭。」⁸¹可見，禮部雖然知道《聖蹟圖誌》轉述的記載不無問題，不過也願意追封關帝三代，因為關羽當然是有祖先的，只是名字不清楚罷了。結果，禮部建議仿照對孟子父親追封的先例，牌位上只寫追封爵號，不書名氏。這其實是承認了地方上祭祀關羽祖考的事實。雍正皇帝不僅贊同禮部的奏請，還御製〈追封關帝三代祭文〉。⁸²可見如同對待孔子一樣，雍正也非常重視關羽。⁸³

朝廷允許地方上的關帝廟在後殿供奉關羽祖考，為此後常平關廟改變建築格局提供了依據。乾隆二十八年（1763），在知州言如泗的主持下，常平關廟建成關聖祖殿，祭祀關羽祖上三代，並配三代聖母，同時以關龍逢為始祖（圖四）。⁸⁴

上述對關羽祖考事跡的追尋與塑造，以及祖塋和祖殿的建設，王朝禮制始終是地方官與當地人辦事的重要依據。同樣，根據禮制，對諸如關羽這樣的聖賢，最好是能有其後裔來負責祭祀活動，關聖後裔遂應運而生。

⁷⁸ 《清世宗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卷五，雍正元年三月甲午，頁118；《欽定大清會典則例》，《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卷八二，頁575。

⁷⁹ 《欽定大清會典則例》，卷八二，頁575–76。

⁸⁰ 清世宗：《世宗憲皇帝御製文集》，《四庫全書》本，卷十八，頁140。

⁸¹ 《清世宗實錄》，卷三一，雍正三年四月庚午，頁466–67。

⁸² 《世宗憲皇帝御製文集》，卷十八，頁144。

⁸³ 王見川認為，「雍正極力將關帝的地位孔子化，希望塑造關帝成為朝廷的另一個儒家典範」。參看王見川：〈清代皇帝與關帝信仰的「儒家化」：兼談「文衡聖帝」的由來〉，載《漢人宗教、民間信仰與預言書的探索：王見川自選集》（臺北：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8年），頁64–69。

⁸⁴ 〈常平里創建關聖祖廟記〉，乾隆二十八年，載《三晉石刻大全·運城市鹽湖區卷》，頁296–97。

誰是關羽的後裔

根據《三國志》的記載，關羽與其子關平同時在荊州為孫權的部將所殺，後來關羽的爵位便由另一個兒子關興繼承。關興去世後由長子關統繼承。關統沒有兒子，爵位便由關興的次子關彝繼承。此後蜀國被滅，關羽後人全部殉難。⁸⁵這是正史關於關羽後代的全部記載，元代胡琦《關王事蹟》中的世系圖便是根據上述內容編成的。⁸⁶

明代中葉開始有人自稱是關羽後代。嘉靖初年任解州判官的著名理學家呂柟為此專門解釋道：「夫隨雲長居蜀者，或止二三子，而關氏宗族在解者，未必盡隨。況興後傳統傳彝，凡三世，則已在〔鄧〕艾入蜀之後，時不相值。而後魏關朗、唐關播，史志及《關氏家譜》及解人世傳，又皆云雲長之裔。此又何以辨也？」⁸⁷他甚至懷疑，因為魏晉人忌恨關羽，故而竄改歷史。⁸⁸由此可見，呂柟是認為關羽有後的。他所見的《關氏家譜》沒有存世，無由知道是何人何時編修的。不過，終明一代，聲稱是關羽後代的人，並沒有在解州關廟或常平關廟留下甚麼事蹟。

入清以後，朝廷延續前朝尊崇關羽的政策。順治九年(1652)，敕封關羽為「忠義神武大帝」。⁸⁹不僅如此，關羽後裔還在政策上享有優免雜差的特權。一份順治十五年(1658)發自平陽府知府的帖文顯示，當時河東道馮嘉會⁹⁰的呈文已經獲得上級同意，在解州與安邑設奉祀生員七人，其他人則除免雜差。此外，馮嘉會還認為平陽府「其餘州縣姓關之人似應優免雜差」，因此命令平陽府知府將所屬十九州縣「將前報冊內姓關之人雜差優免，仍將免口緣由報道查考」。⁹¹可見，清初地方官為了挑選奉祀生員，曾令平陽府所屬州縣查報關姓人的情況。結果，奉祀生員取自解州與安邑縣，不過其他州縣的關姓人卻因此也得以免除雜差。值得注意的是，當時只需要是冊上有名的「姓關之人」，而不必是關羽的「後代」。

雖然不清楚這些「關聖後裔」的活動，不過，聖裔有祭祀權，又可優免雜差，這便促使「關聖後裔」為了確保他們的身份與特權，而作出諸如編修譜系等行為(詳後)。康熙二十八年(1689)〈募修常平關夫子廟記〉的題名中首次出現「後裔生員關守正」，說明這些關羽後裔曾經參與常平關廟的活動。⁹²雍正年間，在地方官的支持

⁸⁵ 《三國志》，卷三六，頁941-42。

⁸⁶ 胡琦：《關王事蹟》，《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本(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頁169-70。

⁸⁷ 顧問(輯)：《義勇武安王集》，《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影印嘉靖四十三年刻本(1998年)，卷二，頁330。

⁸⁸ 同上注。

⁸⁹ 《欽定大清會典則例》，卷八四，頁632。

⁹⁰ 馮嘉會，順治十五年任分守河東道，參看雍正《山西通志》，《四庫全書》本，卷八十〈職官八〉，頁747。

⁹¹ 該帖文見〈聖裔優免碑記〉，碑記寫於康熙三十三年(1694)，嘉慶元年(1796)重刻。該碑原在運城市臨猗縣關源頭村關氏家廟，今仍存於村中。

⁹² 〈募修常平關夫子廟記〉，康熙二十八年，載《三晉石刻大全·運城市鹽湖區卷》，頁241-42。

下，這些後裔更取得世襲五經博士的身份。不過，這是受了河南洛陽關氏的影響，他們依憑洛陽關王塚廟的祭祀禮儀，在康熙末年向朝廷爭取到五經博士的身份。⁹³

洛陽關王塚廟也稱關林，傳說是東漢末年曹操厚葬關羽首級之地。明代後期以前，少有關於關林的文獻記載。萬曆年間，關羽受封為帝，地位上升。在藩王、衛所以及商民的支持下，關林得到大規模地擴建，祭祀活動也繁榮起來。⁹⁴關起鳳自稱關羽第五十四代後裔，他在一篇寫於順治十年（1653）的譜序中，說他祖先關世科萬曆四十二年（1614）遷到洛陽守護關王陵墓，「曾帶舊有家譜，其間備載本宗始末最詳」。⁹⁵根據李屯《關氏族譜》的記載，關世科是山西運城人，所攜帶的家譜抄錄自運城西古村（詳後）。⁹⁶總之，自萬曆末年以後，洛陽關林就有一批關氏在活動。

康熙五十八年（1719），洛陽關林奉祀生關霽自稱是關聖帝君五十六世孫，他向刑部尚書張廷樞呈稱：「原籍解州，遷洛守墓。竊見宋儒邵子、程子後裔，俱恩賜世襲博士。霽祖墳墓在洛，春秋致祭，懇與宋儒後裔一體恩賜博士。」⁹⁷可見，關霽其實以河南本地邵子、程子後裔的做法為榜樣。張廷樞向朝廷轉呈了關霽的請求，並在奏疏中表示支持：「臣思邵子、程子發明忠孝節義之理，關聖帝君力行忠孝節義之事，可否給與世襲博士，出自聖恩？」⁹⁸結果朝廷照准。⁹⁹

雍正四年（1726），鑒於洛陽關林已經得到朝廷的批准，得以設五經博士，解州地方官積極爭取在解州也設一名博士。這得到了山西巡撫伊都立的支持。伊都立向朝廷上疏云：「按之褒崇先聖成例，山東曲阜縣既設有博士等員，而浙江西安縣為孔聖後裔大宗所在，復設博士一員。先賢朱子在福建崇安縣，已設有博士，而江南婺源縣為朱子祖籍，復設博士一員。今關聖在洛陽已奉特恩，准設博士，而解梁原籍，似可一視同仁。」¹⁰⁰禮部支持解州添設博士一員，並打算獲得皇帝批准後，「行文將關帝嫡裔關居斌宗支圖譜、印甘各結取具送部，移咨吏部，照例給筭」。¹⁰¹

⁹³ 明清時期的翰林院五經博士主要授予聖賢後裔，專責祭祀。以孔子後裔為例的研究，可參看邱永君：〈清代翰林中的孔聖後裔〉，《清史研究》2007年第4期，頁85-86。

⁹⁴ 參看趙振華、李培：〈洛陽民間關公信仰與關林修葺〉，載泉州市區民間信仰研究會（編）：《關岳文化與民間信仰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291-301；郭挺彩（主編）：《洛陽關林志》（西安：三秦出版社，2009年），頁1-5；戶華為：〈關林之祀與明清洛陽社會變遷——以關林碑刻為中心的考察〉，《中州學刊》2008年第6期，頁163-66。

⁹⁵ 郭挺彩：《洛陽關林志》，頁164。

⁹⁶ 楊箏：〈洛陽關林鎮關公信仰文化〉（昆明：雲南大學碩士論文，2005年），頁10。

⁹⁷ 《清聖祖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卷二八六，康熙五十八年十月丙寅，頁787。

⁹⁸ 同上注。

⁹⁹ 根據王見川的研究，雖然康熙二十四年（1685）已經議准關氏後裔得以世襲五經博士，但直到康熙五十八年才得以落實，參看王見川：〈清代皇帝與關帝信仰的「儒家化」〉，頁63-64。

¹⁰⁰ 乾隆《解州全志》，乾隆二十九年（1764）刻本，卷十二〈奏疏〉，頁三上至四下。

¹⁰¹ 同上注。

乾隆三年(1738)，朝廷批准解州撥款四十兩給博士作為祭銀，同時添設廟戶二名，在布政司支領十二兩作為工食銀。¹⁰²乾隆四十一年(1776)，山西巡撫更撥款五百兩，讓解州官府置買產業收租，作為關博士的養贍之資。結果解州知州購買了城裏西街鋪房二十四間，每年可以收租六十兩。「每年扣除銀八兩以為修房之費，其餘銀伍十二兩給博士領用」。而且，租金的催收也由官府代勞。¹⁰³可見五經博士有很多經濟上的利益。

五經博士的一個定居點是解州小曲村，且追溯他們「原籍安邑古村」。¹⁰⁴安邑古村，即今天運城市鹽湖區的西古村。一份康熙二十二年(1683)的譜引，記載了關有(或認為是關羽的後代)的墳墓就在西古村正南。¹⁰⁵現在該村村西墳地有一通道光十三年(1833)所立的碑，題曰「勅授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字書升關老先生懿行碑」，以及其他題額為「聖裔」的墓碑。¹⁰⁶另據民國《安邑縣志》記載，西古村「有關氏宗廟，始祖祀關龍逢，次祀帝祖、父及帝本身與帝子孫，並關朗、關播云」。¹⁰⁷存於該村同治九年(1870)編修的《關氏家譜》顯示，西古關氏也藉著編撰譜系，將自己連繫到關羽及關龍逢。¹⁰⁸此外，據村裏熟悉本村掌故的關德城老先生介紹，民國年間，西古村也叫「聖裔莊」。當時村裏有圍牆保護，南城門樓上刻有「聖裔莊」三字，北城門樓上則有「關聖後裔」牌匾。據關老先生說，常平關廟舉辦祭祀的時候，「西古村的人不到，常平關帝廟的正門不能開啟。得西古村的關氏到了，才能開啟」。¹⁰⁹

正是通過上述建築物的建設、名稱的標榜、譜系的編修，以及相關禮儀活動的參與，西古村關氏得以被認為是正宗的關聖後裔。而與獲得祭祀權力相配合的，是依憑關聖後裔這種身份所得到的特權：他們的戶籍專門登記在「崇關里」，得以「豁免差役以示崇異」。¹¹⁰

¹⁰² 同上注，卷五〈職官〉，頁二四上。

¹⁰³ 〈解州正堂李友洙為關博士養贍立案碑記〉，乾隆四十二年(1777)，載《三晉石刻大全·運城市鹽湖區卷》，頁306-7。

¹⁰⁴ 徐嘉清(修)、曲迺銳(纂)：《解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山西府縣志輯》影印民國九年(1920)石印本(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年)，卷二〈氏族略〉，頁37。

¹⁰⁵ 關文榜、關文炳(編)：《關氏家譜》，收入《關帝文獻匯編》第8冊，頁427。

¹⁰⁶ 根據筆者的田野筆記，2011年12月26日。

¹⁰⁷ 景定成(總纂)，運城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整理)，樊道白、張博文、暢筠(點校)：民國《安邑縣志》(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卷十二〈古跡記〉，頁207。

¹⁰⁸ 《關氏家譜》，清同治九年修，1987年重抄，無頁碼。

¹⁰⁹ 根據筆者的田野筆記，2011年12月26日。

¹¹⁰ 民國《安邑縣志》，卷十二〈古跡記〉，頁207。科大衛對明代中後期山西夏縣司馬光「後裔」的研究也表明，這些「後裔」的出現，既與官府祭祀司馬光的禮儀需要有關，同時也有現實利益的考量：官府專門為奉祀司馬光的後裔提供了一塊土地。見 David Faure, "It Takes a Sage . . . : Notes on Land and Lineage at Sima Guang's Grave in Xia County, Shanxi Province", 《民俗曲藝》第131期(2001年5月)，頁27-56。

結語

常平關廟本是不受官府重視的鄉村小廟，明代中葉在打擊池鹽走私的背景下，官方勢力才不斷地介入，改建了廟宇並將其納入官府的祭祀範圍。這既改變了常平關廟自金代以來佛教影響下的祭祀傳統，也為地方文化的重新塑造提供了契機。明末以降，解州官員與常平關廟附近士民相互配合，試圖藉著重塑關羽信仰的內容，將常平打造成跟山東關里一樣重要，從而一改之前鹽梟淵藪的形象。喬新華對晉南的研究也表明，明中葉以來，官員與士民重新發明堯、皋陶等遠古聖王聖臣，以此改造地方文化。¹¹¹可見，對諸如關羽信仰等的重塑，是當時山西地方社會拉近與國家關係的一種普遍策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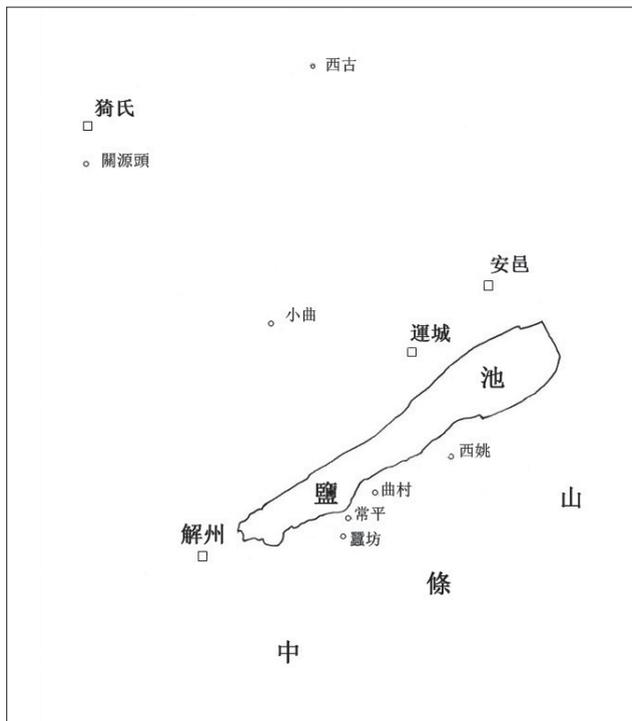
重塑關羽信仰既與地方社會自身的發展有關，同時也受王朝禮制的影響。明末關帝祖塋的「發現」、清康熙年間關羽祖考的塑造，以及雍正年間向朝廷的請封，就是官員與鄉村士民因應國家禮制而採取的行動。從上述過程可以瞭解到，研究關帝信仰，除了認識到皇帝利用關羽崇拜來維持統治的一面，¹¹²同時也需要關照到地方社會是如何因應國家禮制以改造關帝信仰的內容，從而更好地服務地方利益。

與禮制變動相配合的，是建築物的改變。明中葉，解州地方官根據儒家倫理以及官方規制，對常平關廟進行大規模地改建；對關羽祖考的祭祀在雍正年間獲得朝廷承認後，地方官於乾隆年間在廟裏創建了關聖祖殿。建築物的這種演變，既體現了國家禮制的應用，也反映了地方社會的變遷。同樣，關羽後裔的出現也跟禮制息息相關。正是由於國家對奉祀生或五經博士的需要，以及與此相配合的諸如優免雜差等優惠政策，才催生了所謂的「關聖後裔」。為了取得與維持這種特殊身份，這些「後裔」又積極地修建宗廟，編修譜系，並參與相應的祭祀活動。在上述過程中，王朝禮制與祭祀禮儀，始終是地方社會與王朝國家互動的基本議題。

¹¹¹ 喬新華：《為甚麼是洪洞：大槐樹下的文化傳統與地方認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頁194–2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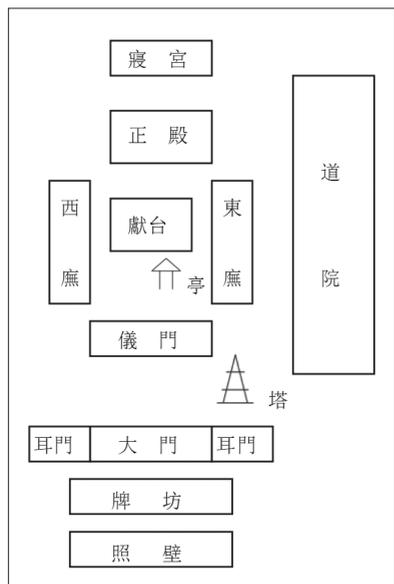
¹¹² 例如王見川：〈清代皇帝與關帝信仰的「儒家化」〉，頁55–75。

圖一：鹽池及周邊示意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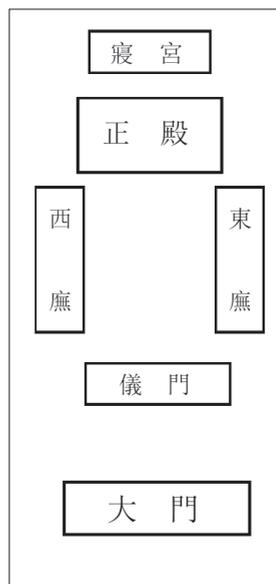


資料來源：據《運城市志》(北京：三聯書店，1994年)之「運城市政區圖」改繪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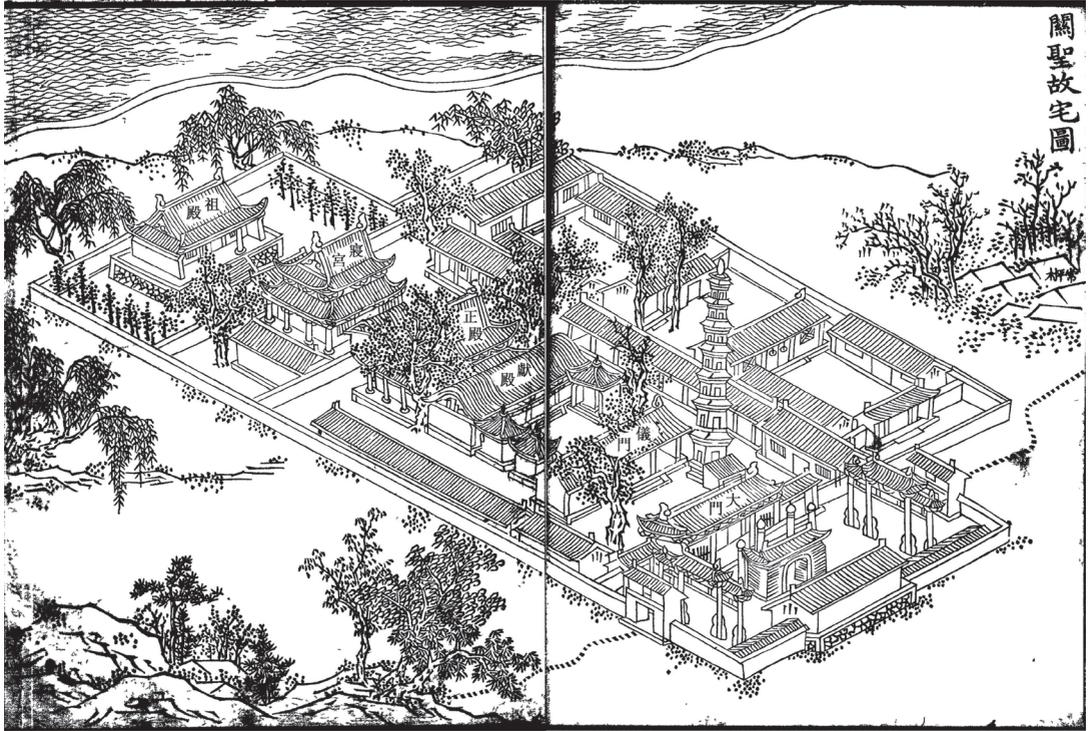
圖二：嘉靖後期改建後的常平關廟



圖三：嘉靖五年擴建後的運城關王廟



圖四：乾隆中期的常平關帝祖祠



資料來源：乾隆《解州全志》，〈本州圖〉，頁十二下至十三上。

Guan Yu's Ancestors and Descendants: A Case Study of the Changping Guandi Temple in Shanxi Province

(Abstract)

Huang Zhuangzhao

The Changping Guandi Temple in Shanxi province was only a small village temple which did not gain attention of the local authorities before mid-Ming. In order to extend their power to the south of the salt lake where the temple stood, the local officials rebuilt the temple and brought it into the official sacrifice system during the mid-Ming era. This changed the traditional way of sacrifice, which wa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Buddhism since the Jin dynasty, and also offered an opportunity to reconstruct the local culture. Since the end of the Ming dynasty, the local officials, intellectuals, and villagers cooperated actively, hoping that Changping could become as important as Queli (hometown of Confucius) in Shandong. They knew well about the changing of the national etiquette system and used the etiquette as a tool for the purpose of benefits for the local society, which can be seen through the following activities: the “discovery” of the grave of Guan Yu’s grandfather, the rewriting of Guan Yu’s father’s and grandfather’s stories, and the request of investiture for Guan Yu’s ancestors in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Coordinating with the change of etiquette system, the architectural pattern of the Changping Temple changed at the same time. The local officials rebuilt the temple to fit the national norm in the mid-Ming. After being recognized by the court, the local officials set up a new hall to worship Guan Yu’s ancestors during the mid-Qing period. Besides, because the national worship for Guan Yu required his own posterity, who could thereby benefit much through the policy in the Qing dynasty, some people began to declare that they were Guan Yu’s descendants. To obtain and sustain their special status, they built an ancestral hall, compiled the genealogy, and attended related sacrifice activities. Such changes of the architecture and the sacrificial ritual reflect the use of the national etiquette system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local society.

關鍵詞： 山西 關帝 祖先 後裔 地方社會

Keywords: Shanxi Guandi ancestor descendant local society